

# 第一部分

## 民间投资的理论研究



# 第一章

## 民间投资运行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投资的发展和因此促成的民营经济的壮大，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的重大成果，也是我国持续保持高速度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在肯定这一基本事实的前提下，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国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还面临诸多的制约与障碍，其发展潜能还远未充分调动出来。这已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从“政策拉动型”向“自主增长型”的转型，进而影响了我国可持续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因此，“启动民间投资 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本课题以此为研究主题，首先从理论上分析民间投资的基本内涵，深入探究民间投资的内在运行机制，从而为研究的深入展开奠定重要理论基础。

### 第一节 民间投资的理论内涵

任何理论概念的提出都有其经验事实基础，“民间投资”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公有制经济大一统局面被逐渐打破，其他所有制经济成分快速发展这一事实。我们之所以在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著作中难觅“民间投资”这样的概念，就是因为离开了转轨经济的宏观制度背景，就不可能产生“民间投资”这样的中国化的研究范畴。“民间投资”这一概念可从语义上直观理解为“来自民间的投资”，它是相对于国有投资和外商

投资而言的，属于投资来源或投资主体的概念划分，但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具有深刻制度内涵的范畴。

## 一、民间投资的概念界定

### （一）经典投资概念

#### 1. 投资的概念

民间投资当然属于投资的概念范畴，投资的理论内涵对民间投资仍然具有普遍意义，理解投资的概念是理解民间投资概念的前提。在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中，投资的概念一般与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概念相联系，经济学家通常用资本增量来定义投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是西方经济学家，他们大都把投资与资本活动联系在一起。马克思认为：投资，即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与此相类似，西方经济学家一般也将投资与资本存量的变动联系在一起。凯恩斯指出：投资就是资本设备的净增加。由于资本不仅包括物资资本，还包括人力资本，把投资与资本全面地联系在一起，从储蓄的角度来定义投资是很有意义的。萨缪尔森在给投资下定义时指出“投资涉及为了增加未来的消费而牺牲目前的消费”，“投资是为了增加未来的产量而放弃目前的消费”。从这一角度来定义投资，拓宽了投资的界定范围，人力资本投资也包含其内，因为人们接受教育和培训并不属于目前的消费行为，而是为了增加未来的消费而对目前的消费做出的牺牲，它的表现形式是消费，而其实质是储蓄，是人力资本的投资形式。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资本除了生产性资本之外还包括通过购买金融产品而形成的金融性资本。美国学者赫伯特·E. 杜格尔、费朗西斯·J. 科里根在其所著的《投资学》中指出：“广义的投资是指以获利为目的的资本使用，包括购买股票和债券，也包括运用资金以建筑厂房、购置设备、原材料等从事扩大生产流通事业。”

综上所述，我们可将投资的一般定义表达为：投资是一定的经济主体为了获取预期的、不确定的经济利益而将现期的一定收

入通过特定的方式转化为资本的行为和过程。我们所要研究的民间投资在广义上应该同时涵盖实物投资和金融投资，但出于研究目的和本书主题的考虑，我们这里所指的民间投资仅涵盖实物投资（尤其是生产性实物投资，统计上主要是指固定资产投资）。

## 2. 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

在经典投资理论中并没有民间投资及相关的概念划分，较为接近的只有关于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的划分。在有关经济增长的文献中，公共投资一般被界定为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形成的固定资本，由于存在政府不能在微观层面上直接介入企业活动领域的特定认识，这些政府投资往往被限定在特定的公共服务领域中，因此这些资本被称为公共投资，有时也被称为政府投资。Holtz-Eakin(1993)在分析美国公共投资的形成与增长时，将公共投资按照其最终用途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教育投资；第二类是道路以及高速公路投资；第三类是污水处理设施投资；最后是公用事业投资。在经济增长研究中，之所以将投资分离为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是因为公共投资在经济增长中有其独特的意义，最突出的就是公共投资的主要领域往往具有典型的外部效应。比如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它的发展直接为以公共基础设施为发展基础的相关产业部门的扩张提供了支持，因此许多研究文献强调公共投资扩张对私人投资效率提高产生的积极意义（Vijverbergetal, 1997; Fisheretal, 1998）。由此可以看出，实质上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的划分理论与我们所要研究的民间投资及其相关划分的理论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

### （二）民间投资的内涵

民间投资及相关的概念划分与通常意义上的投资类型的理论划分不同，其特殊性就在于其深刻的制度内涵，即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把握民间投资内涵的基本出发点。因此，所有制分析是民间投资概念界定的理论基础，其相关的研究范畴包括非

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民间投资。

### 1. 关于“非公有制经济”

所谓“非公有制经济”是同传统的公有制经济相对应的一种所有制形式。“非公有”与“公有”相区别的基本标志是出资人的不同。若出资人是国家或集体，它就是国有或集体经济，统称为公有制经济；若出资人是私人（含自然人和私营企业），它就是非公有制经济。从制度层面看，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是从单一的公有制向多元化的所有制演化转变的过程。在今天的中国，除传统意义上的国有、集体等公有制经济外，还出现了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如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各种私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虽然公有与非公有的所有制二分法是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基本范式之一，但随着多元化所有制结构的逐步形成，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已不能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例如，随着股份制的广泛推行，公有与非公有的界限已被逐步打破，混合所有制已逐渐增多。尽管我们可以根据占控股地位的资本的性质界定所有制性质，但从本质上讲，混合所有制经济已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公有或非公有制经济。因此，从所有制分析出发，但又不囿于公有与非公有的简单划分，这是把握民间投资内涵的一个基本点。

### 2. 关于“民营经济”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考察，非公有制经济是民营经济演化而生的重要制度渊源，但民营经济并不等同于非公有制经济。就概念内涵而言，民营经济这一概念的提出淡化了所有制划分的意味，强化了经营方式的内涵。与相对应的“官营”或“国营”相比较，它更强调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经济相比所凸显的经营机制的灵活性，将人们从固有的所有制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同时，它也更加关注企业经营运作的实际效率问题。就概念外延而言，非公有制经济涵盖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私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等多种成分，而现在一般意义上的民营经济

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私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及原属于公有制经济成分的集体经济。因为集体经济大多经过了股份制改造 特别是一大批摘掉了“红帽子”的乡镇企业 在经营方式上更加贴近民营经济的实质。可见，两者在概念的外延上有交叉，但又有很大区别。因此，可以说民营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属于不同的范畴。

### 3. 关于“民间投资”

明确了民营经济的内涵，也就界定了民间投资的主体范畴。民间投资是来自于民营经济所涵盖的各类主体的投资，具体包括个体投资（居民个人的生产性投资和住宅投资、城乡个体工商户经营性投资）私营企业投资、私有资本控股的股份制企业投资以及集体企业投资。与民营经济相对应的范畴是国有经济与外资经济，那么在社会总投资的大范畴内，与民间投资相对应的就是国有投资和外商投资。国有投资具体包括各级政府的财政性投资、政府主管的社团组织和基金会等非盈利性组织进行的各种投资、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以及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的股份制企业的各类投资，外商投资就是各类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

## 二、民间投资的统计口径

尽管我们可以较为准确地从理论上界定民间投资的内涵和主体范畴，但由于现实可得统计资料有限（在各类统计年鉴中，还没有将民间投资、国有投资、外商投资作为标准的统计分类），我们还无法直接获得与理论上界定的民间投资口径完全一致的统计数据资料。因此，我们需要在现行投资统计分类的基础上做相应调整，以得到相对准确的民间投资的相关统计数据（这是我们开展研究的重要基础）在现行的《中国统计年鉴》等官方统计资料中，全社会投资按投资主体的经济类型分为七大类，即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股份制经济、联营经济、外资及港澳台地区经济和其他经济。以此为标准，我们将集体经济、个体经济、

股份制经济、联营经济和其他经济这五类主体的投资相加，或在全社会投资中减去国有经济、外资及港澳台地区经济这两类主体的投资，便可得到现行统计意义上的民间投资。按此统计口径得到的有关民间投资的数据中仍然存在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未从股份制经济中剔除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的投资单位的投资，没有从联营经济中剔除相应的国有资本应占的投资份额。因此，这一统计口径的民间投资是有所放大的，但考虑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股份制经济、联营经济这类的经营主体越来越具有独立经营的“民营”性质，将之完全纳入民间投资的范畴在实质上与民间投资的内涵是不悖的。

### 三、民间投资的理论特征

#### 1. 投资主体产权的清晰性

长期以来，国有投资过程中一直未解决的重要问题是投资所有者缺位和非“人格化”，由此造成了投资责任和权利的非对称性。民间投资者集资产的所有者和投资主体于一身，具有清晰的产权边界，是最具“人格化”的投资主体。民间投资主体拥有投资活动的全部权利，完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是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特征的微观投资主体。

#### 2. 与市场经济联系的直接性

与国有投资不同，民间投资本身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内生化的结果。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投资几乎一统天下，个人只是作为消费者，民间投资几乎为零。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改革的不断深入，民间投资登上了历史舞台。民间投资活动过程完全遵循市场机制，生产要素配置靠市场调节，投资行为完全受市场规律制约，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因此，民间投资的发展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直接联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 3. 投资动机的逐利性

民间投资与国有投资的另一个大的区别还在于投资动机。国家作为全体公民的代表，具有多元的目标函数，国有投资的根本动机在于追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经济效益有时倒不是最重要的目标。民间投资则不同，其根本动机就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和投资回报的最大化。尽管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民间投资的实际结果也能增加社会福利，但民间投资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其本质的出发点的。逐利性的特点决定了民间投资的动力和方式。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民间投资为追求利润而进行投资，对利润的追求是无止境的，这种无止境的对利润的追逐成为民间投资增长的内在动力。同时，民间投资的逐利性特点也决定了其投资方向集中于投资回收快、投资收益高的领域。任何影响投资收益的市场经济变量，如利率、汇率、价格、税收等的变化都会引致民间投资的变动，民间投资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显示出高度的相关性。

### 4. 投资空间的地域性

由其发展的过程和基础所决定，民间投资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具体表现在：一是投资活动基本上在某个区域内展开，资金、劳动力、设备、原材料、能源均立足于这一区域，区域环境对民间投资有较大影响；二是民间投资产品或服务销售立足于局部市场，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供求状况对民间投资影响很大；三是民间投资的发展状况对当地经济发展将产生直接的影响。我国民间投资由于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模式，如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

### 5. 抗风险能力的脆弱性

民间投资资金分散，各自为战。目前，民间投资在总体实力上与国有投资相比较弱，与外商投资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相比也有很大差距。在投资风险面前，民间投资是天然的“风险回避者”，一旦市场有个“风吹草动”，民间投资就会“畏缩不前”。因

此，民间投资需要国家和政府的引导、支持，以增强其抗风险能力。

#### 6. 投资决策的追随性

由于民间投资的逐利性与市场联系的直接性，“市场失灵”在民间投资上也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市场经济本身具有不完全信息的特点，我国在市场经济建设初级阶段更是如此，因而民间投资者不能完备地掌握市场信息，不可避免地在制定投资决策时有一定的盲目性。民间投资者具有“追高不追低”、“追热不追冷”的盲从心理，使民间投资往往产生“羊群效应”，容易造成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因此，加强对民间投资的信息指导和引导，提高民间投资者的决策水平，是发展民间投资的关键环节。

## 第二节 民间投资的宏观运行机制

从理论上考察民间投资的内在运行机制是本课题研究深入开展的理论基础。我们从宏观和微观双视角切入，分别考察我国民间投资的宏观运行机制和微观运行机制。由于我国民间投资是一个有着深刻制度内涵的概念，对民间投资宏观运行机制的分析不能囿于传统投资理论，不能只关注真实经济因素对民间投资的影响，而应该从我国转轨经济制度变迁的视角去深入探索其制度根源。

### 一、理论综述

在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中，投资被视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重要变量，对投资宏观运行机制的研究是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西方宏观投资理论

在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对投资运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

方面：一是投资的决定；二是投资与经济增长；三是投资与经济波动（即经济周期）。

### 1. 投资的决定

决定投资的因素有很多，在现代经济学中主要包括实际利率水平、预期收益率和投资风险等。

(1) 实际利率与投资。凯恩斯在其关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论著中指出，是否要对新的实物资本如机器、设备、厂房、仓库等进行投资，取决于这些新投资的预期利润率与为购买这些资产而必须借入的款项（借款筹资的方式可有多种）所要求的利率的比较结果。当前者大于后者时，投资是值得的；当前者小于后者时，投资就不值得。因此，在决定投资的诸因素中，利率是首要因素。这里的利率是指实际利率。实际利率<sup>①</sup>大致上等于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当投资的预期利润率既定时，企业是否进行投资，首先就取决于利率的高低。利率上升时，投资需求量就会减少；利率下降时，投资需求量就会增加，即投资是利率的减函数。这是因为企业用于投资的资金多半是借来的，利息是投资的成本；即使投资的资金是自有的，投资者也会把利息看成是投资的机会成本，从而把利息当作投资的成本。因此，利率上升时，投资者自然就会减少对投资物品（如机器设备等）的购买。

(2) 预期收益与投资。从投资使用的资金的成本角度探讨投资需求，实际利率水平会影响投资需求。影响投资需求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预期收益，即一个投资项目在未来各个时期估计可得到的收益。影响这种预期收益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三点：一是对投资项目产出的需求预期。企业决定是否对某项目投资及投资多少时，首先会考虑市场对该项目的产品的未来需求

<sup>①</sup> 实际利率是指物价不变，即货币购买力不变条件下的利息率  $i$ ；它与包括补偿通货膨胀率  $\pi$  风险的名义利率  $r$  间的关系表达式为： $r = (1 + i)(1 + \pi) - 1$ 。

情况，因为这种需求状况不但会决定产品能否销售好，还会影响产品价格的走势。如果企业认为投资项目的产品市场需求在未来会增加，它就会增加投资。假设一定的产出量要求有一定的资本设备量，则预期市场需求增加多少，就会相应要求投资增加多少。二是产品成本。投资的预期收益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投资项目产品的生产成本，尤其是劳动者的工资成本。因为工资成本是产品成本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工资成本的上升会降低企业利润，减少投资预期收益，尤其是对那些劳动密集型产品投资的项目而言，工资成本的上升显然会降低投资需求。然而，对于那些可以用机器设备代替劳动力的投资项目，工资上升又意味着多用设备比多用劳动力更有利可图，因而实际工资的上升等同于投资预期收益的增加，从而会增加投资需求。由此可见，工资成本的变动对投资需求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但就多数情况来说，随着劳动成本的上升，企业会越来越多地考虑采用新的机器设备，从而使投资需求增加。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投资需求会随工资的上升而上升的理由所在。三是投资税抵免。在一些国家，政府为鼓励企业投资，会采用一种投资税抵免的政策，即政府规定投资的厂商可从它们的所得税单中扣除其投资总值的一定百分比。这种投资抵免政策对投资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政策是临时的，还是长期的。如果是临时性采取的，则此政策的效果也是临时的，过了政策期限，投资需求可能反而下降。比方说，如果政府为刺激经济宣布在某一年实行投资抵免，则该年的投资可能大幅度增加，甚至本来准备来年投资的项目也可能提前到该年进行投资，但来年投资需求会明显下降。另外，在政策实行的前一年，企业可能会把一些项目推迟到有政策鼓励的时期再进行投资。

(3) 风险与投资。投资需求还与企业对投资的风险考虑密切相关。这是因为，投资是现在的事，收益是未来的事，未来的结果总有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的结局会有一个预测，企业正是根据

这种预测制定投资决策的。然而，即使是最精明的企业家也不可能完全准确无误地预测到将来的结果 因此 投资总有风险 并且高的投资收益往往伴随着高的投资风险，如果收益不足以补偿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企业就不愿意投资。一般说来，当整个经济趋于繁荣时 企业对未来看好 会认为投资风险较小 而当经济呈下降趋势时，企业对未来看法悲观，会感觉投资风险较大。所以凯恩斯认为，投资需求与投资者的乐观和悲观情绪大有关系。实际上，这说明投资需求会随人们承担风险的意愿和能力的变化而变动。

## 2. 投资与经济增长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以索罗、丹尼森等为代表提出的当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都涉及了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无不例外地讨论了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归纳起来 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一方面 经济增长水平及其速度决定了投资的总量水平，因为特定时期投资总量的大小是由以前国民收入的多少以及积累率的高低所决定。另一方面，在资源数量以及技术水平既定的前提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总量的大小以及投资的增长幅度大小，因此投资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拉动作用。

关于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数量关系，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一般用投资—经济增长总量模型来说明。如果用  $Y$  表示特定时期的国民收入； $I$  表示对新增生产要素的投资，它包括对生产过程中新购置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和新增加的劳动力等的投入； $v$  为资本—产出比率，通常也用它表示促进国民收入增长的技术性因素；由于生产过程中还有一些非技术性因素，如劳动力的优化组合、劳动组织的改进、管理效率的提高等 我们用  $\epsilon$  表示这类因素。这样，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静态模型可表述为：

$$\Delta Y = \frac{I}{v} + \epsilon Y \quad (\text{公式 1.1})$$

公式 1.1 中  $\Delta Y$  为国民收入的增量； $I/v$  是由于投资  $I$  所带来的国民收入增量部分， $\epsilon Y$  为非技术性因素导致的国民收入增量部分。假定在特定时期内  $v$  和  $\epsilon$  保持不变，那么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可以用投资率来表示：

$$\frac{\Delta Y}{Y} = \frac{1}{v} \cdot \frac{I}{Y} + \epsilon \quad (\text{公式 1.2})$$

如果用  $g$  表示国民收入的增长率， $R$  表示投资率，公式 1.2 可改写为：

$$g = \frac{1}{v} \cdot R + \epsilon \quad (\text{公式 1.3})$$

从公式 1.3 可以看出，当  $v$  和  $\epsilon$  保持不变时，投资总量与国民收入总量保持同步增长，即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投资的增加会提高产出水平和就业水平，这在逻辑上是必然的。

### 3. 投资与经济波动

在宏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投资规模经常呈现扩张与收缩交替出现的周期性变动现象，这种投资规模有规律的时间变化被称为投资周期。综观国内外的经济发展过程，投资规模变化虽在持续的时间序列上并不完全一致，但仍然有一定的规律性，这种周期可以显示在投资额、投资增长额等指标的不断波动上。相关的实证研究表明，投资周期与经济周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投资波动因而被视为影响经济波动的关键因素。在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不同学派对投资周期、投资波动有不同的理论解释，其中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如下：

(1) 产品周期论。产品具有从被人们接受到普及再到需求下降的周期性特点，这就决定了投资规模的周期性变化。每一部门投资规模的变化方向与产品的市场需求变化方向一致，而各部门的商品周期之间既可以同步，也可能存在差异。部门间投资周期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投资规模的增减波动；而部门间投资周期的同步则使投资规模幅度加大。因此，产品周期是引起经济周期与投资周期运动的最主要原因和物质基础。

(2)物流与价值流的不一致论。一方面投资活动总是在前期增加对市场产品的需求，货币量大于使用价值运动量，提高了产品的价格和厂商的利润率，因此投资规模增大。投资后期由于市场产品供给的增加，货币量小于使用价值运动，降低了产品价格和厂商利润率，投资规模渐趋收缩。另一方面，分配形成的生产结构变化滞后于分配结构的变化。如在一个社会的投资扩张期，消费品投资不断实现，然而投资却转向生产资料生产部门，造成价值的需求结构与使用价值的供给结构不一致，导致价值量变化与使用价值量变化不一致，推动价格水平的波动和经济结构的非均衡运动，引起投资规模的变化。

(3)社会资源的有限性论。在市场条件下，投资扩张往往使对社会资源的需求超出社会储蓄的供给。同时，由于经济波动的幅度小于投资的波动，因此，扩张时期社会资源的供给增加小于投资扩张的需求增长，致使短缺部门在资金制约的作用下发生转变。

(4)技术创新论。技术创新本身具有间歇性的特点。一项重大的技术突破可以提供较多的投资机会，这使投资呈现出在技术积累期间较少，在技术成熟后较多的周期性变化。

(5)投资乘数—加速数模型。关于投资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关系的经典理论解释是萨缪尔森的投资乘数—加速数模型。投资乘数原理说明了收入的变化对投资的作用，加速原理则反过来研究投资的变化对均衡收入的影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据此提出了投资乘数—加速原理的相互作用模型。该模型的基本原理大致为：假设自发性投资增加，由于乘数原理的作用，这一增加的投资支出将引起收入增量的成倍增加；而后，由于加速原理的作用，这一收入增量的增加又将引致新的投资。这一新的投资通过乘数原理，使国民收入进一步增加。如此，乘数和加速原理交替作用，引起投资规模的周期性变化。

## (二) 社会主义宏观投资理论

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中，对投资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是以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的，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又根据各国的实践发展了相关的理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如下：

### 1. 马克思论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马克思不仅多次使用投资的概念，而且对投资下过明确的定义：“投资即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资本是投资的结果。在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上，马克思并没有在严格的意义上使用“经济增长”这一概念。所有经济增长的含义在马克思那里都是用“扩大再生产”的概念来表述的。马克思认为，扩大再生产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特征。资本家为了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并增强竞争力量，并不会把已经得到的全部剩余价值都用于个人消费，而会将其中的一部分转化为新的资本，用来购买新的或追加更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使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本数量不断增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各个资本家都力图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这又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因此，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迅速增长的经济，尽管它在增长过程中会遇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马克思对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具有以下特点：

(1)它十分重视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认为资本使用数量的增加和使用效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2)它十分重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把技术进步与资本投资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曾经说过：“固定资本的发展标志着已达到把普遍的社会知识变成直接生产力的程度。”

(3)它与劳动价值论并不矛盾。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源泉，而剩余价值则是资本积累的惟一源泉。资本家为了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就必须“靠一定的资本物化尽可能多的直接劳动时间”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资本家必须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增加资本投资。劳动力是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即可变资本的物质形态存在的，

因此，无论是资本使用数量的增加，还是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都离不开劳动力。

## 2. 卡莱茨基论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中，卡莱茨基的理论具有很大的影响和很高的代表性。卡莱茨基把国民收入的最终支出分为：生产性固定资本投资、增加的存货、非生产性固定资本投资、集体消费、个人消费及进出口差额，并认为前两项之和为生产性积累，第三、四、五项之和为包括非生产性投资在内的广义消费。如果进出口差额为零，则国民收入等于消费加投资。在既定的国民收入中，消费和投资是一对矛盾，它们之间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卡莱茨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是由三部分决定的：第一，由投资引起的国民收入增加，也即增加量  $\Delta Y = I/m$ ；第二，由设备报废引起的生产能力缩减，也即减缩量  $\Delta Y = \delta Y$ ， $\delta$  是折旧系数，表示国民收入减少量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第三，因改善现有生产能力利用率而引起的国民收入增加量， $\Delta Y = uY$ ， $u$  是对现有生产能力利用程度的改善系数。这样，年国民收入总量为：

$$\Delta Y = I/m - \delta Y + uY \quad (\text{公式 1.4})$$

等式两边同除以  $Y$  得：

$$r = \frac{i}{m} - \delta + u \quad (\text{公式 1.5})$$

式中  $i = I/Y$ ，是生产性固定资本投资率。通过引入存货的投资增加量，我们可得到一般的投资率  $i$  和包括存货增加在内的一般的投资系数  $k$ ，于是推导出卡莱斯基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一般模型：

$$r = \frac{i}{k} - \frac{m \cdot (\delta - u)}{k} \quad (\text{公式 1.6})$$

该增长模型表明决定经济增长率  $r$  的主要因素是投资率  $i$ 、投资产出系数  $k$ 、生产性固定资本投资系数  $m$ 、折旧系数  $\delta$  和改进系数  $u$ 。这些因素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它们共同决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经济增长。